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共融 ——兼论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数字人文

王宁

摘要: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思潮,后人文主义近年来已经进入中国,并对传统的人文主义甚至人文学科构成了挑战。实际上,中国的科学与人文思潮来自西方,在新文化运动中同时登陆中国,它们的和谐相处和互动、互补及共融为我们今天评估后人文主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确实,“后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起表明,在当今时代,人类也如同那些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那样,仅仅是自然界的物种之一,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自然的法则。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事实,就无法合理有效地发展人类自身。后人文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的,但是也与人文主义有着某种延续性。它告诉我们,过高地估价人的作用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的演化已使其进入一个“后人类”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人类再也不是地球上唯一的具有理性的生灵。但是人类可以发明创造出各种奇迹,有些创造出来的奇迹甚至连自己也无法掌控。虽然后人文主义的兴起对传统的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构成了挑战,但是用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人文学术的教学和研究仍不失为一种适当的理念。因此,数字人文概念的提出,完全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新的互动、互补和共融关系。

关键词:科学与人文;后人文主义;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 I059.99;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4-0007-09

如果我们不否认“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①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我们现在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②。在这一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具有解释一切的力量。理论只能有效地解释我们周围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所有那些“后理论”(post-theories)中,后人文主义正日益变得具有影响,并且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关系愈益密切。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西方,而且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在当今的中国。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知识潮流,率先吸引了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的批评性和学术性关注,接着也引起了那些对人文学术感兴趣的科学家的关注,他们大多认识到这种现象的重要性以及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潜在作用。虽然中国尚未完全进入后现代社会,但它已经具有了许多后现代征兆,尤其是在那些大都市和发展迅速的沿海城市,这种情况更是明显。在“后人类”时代,传统的人文主义与科学技术相遭遇并受到后

① EAGLETON T.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1.

② 关于“后理论”问题,笔者在国内已经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了一部专著,此处毋庸赘言。这方面可以参阅:王宁.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王宁. 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 文景, 2005, (3); 王宁. “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 外国文学, 2005, (3); 王宁. 穿越“理论”之间: “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和文化建构. 中央大学人文学报, 2007, (32); 王宁.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 王宁. 再论“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 学术月刊, 2013, (5); 王宁. “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 走向后人文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 2013, (6); 王宁.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5, (1).

者的挑战甚至威胁。接踵而来的便是人文学科的危机和人文学术的萎缩。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仍然认为,科学与人文并非一定要呈一种对立的关系。我们应该找到某种可以协调这二者的东西,在二者间进行沟通和对话。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在那场名为“新文化”的运动中,科学与人文都得到学者们的高扬和推介,而且这二者实际上也相处和谐,呈一种互动、互补和共融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朝着一个现代文明和科学民主的国家发展^①,也即它们帮助促成了中国的现代性大计。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旨在对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及其演变进行历史和理论的反思,然后再讨论后人文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兴起以及所产生的后果。

一、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历史反思

毫无疑问,中国有着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儒家学说盛行的时期。那时,儒学不仅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普通民众中也颇有影响。我们都知道,孔子本人首先就是一位教师,如果我们承认他的独特作用的话,我们便可以更确切地说他就是一位人文学科的教师,尽管当时“人文学科”这一术语尚未出现。他十分热衷于在他的弟子和广大追随者中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说,而且确实,他本人的许多闪烁着人文主义光辉的学说至今仍为当代新儒家所发扬光大。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和思想潮流的欧洲人文主义,直到20世纪初才通过翻译引入中国^②。它为什么会在中国的语境中得到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有着适宜的文化土壤供域外的人文主义驻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尤其是对于那些国内学者来说,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人文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则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甚至它在中国的语境中一度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受到严厉批判。因此,他们往往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大计的开始,因为它也是全球现代性语境中的一种另类的现代性^③。但是近几年来,从文化和人文主义的视角着眼,同时参照海外汉学家现有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实际开始的年代应该是1915年,因为就在那年,在广大人文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也因为就在那一时期,一些中国的杰出知识分子,如鲁迅和周作人,已经在他们的文学作品或批评著述中提出了“人的文学”的观念,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方向。这显然是中国语境中对欧洲人文主义概念的创造性移植、运用和重构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本土资源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我们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便不难发现,正是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和李大钊这些或在西方受过教育或自身有着深厚西学造诣的知识精英,率先发起了“反传统、反儒学和反文言文”的思想文化运动,其目的在于全方位地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那一时期的中国,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还发起了大规模翻译西学的运动,诸如尼采、斯宾塞、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样的欧洲思想家在中国的语境中被人们频繁地引证和讨论,在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中甚至流行着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科学理念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原则,作为其结果,“德先生”和“赛先生”被同时引入中国,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科学和民主的进程。但是我要在此补充的一点是,他们还引入了一位“胡先生”(Mr. Hu, Humanism),也即人文主义。那时影响极大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论坛,一些主要的中国思想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发表了介绍先进西学的文章,包括科学和人文主义,并以此来启蒙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人文学术,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①王宁. 走向世界人文主义: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世界意义. 探索与争鸣, 2016, (1): 91-96.

②在中文的语境中, humanism 至少有三种译法: 人文主义, 人本主义, 人道主义。每一种译法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在本文中, 我用第一种译法, 即人文主义。

③关于中国的现代性及其特征, 参阅 WANG Ning. Translating Modernity and Reconstructing World Literature. Minnesota Review, 2012, (79): 101-112; WANG Ning. Multiplied Modernities and Modernisms? Literature Compass, 2012, 9(9): 617-622; 王宁. 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 文艺研究, 2002, (6); 王宁. 消解“单一的现代性”: 王宁. 重构中国的另类现代性. 社会科学, 2011, (9).

毫不奇怪，虽然新文化运动由于其激进的主张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仍有着很大的争议，主要是因为其对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的破坏甚大，但是它却在当时的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精英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从旧的专制国家向新的现代相对民主的国家过渡的时期。新文化运动至少有着主张民主反对专制、推崇科学反对迷信的倾向，并且反对旧的道德准则，提倡新的伦理道德，大力弘扬一种新的现代汉语和文学，反对文言文。因而尽管它有着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色彩，但仍一直被叫做文化运动。由于大量的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化 and 思想潮流通过翻译的中介蜂拥进入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无政府主义等，这场运动又带有鲜明的全盘西化色彩，在这一全盘西化的过程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古汉语也被全然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白话文在普通民众中的大力推广和实践。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重估这场运动的意义的话，那么它的另一层意义就在于此。甚至在今天，当儒学在当代中国复兴之际，它实际上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重构，并且和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义相结合：摒弃其专制思想的糟粕，大力弘扬其人文精神。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不管新文化运动有多么大的争议，但至少它激励了科学和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快速发展。

确实，也如同其他新的文化知识潮流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兴起那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也收到了一些保守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它推行一种全盘西化的原则，并把鲁迅当作罪魁祸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场运动全然摒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促成了一种“不中不西”的新的现代文化和文学范式的建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甚至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仍然认为，不管我们是强烈反对还是大力赞美新文化运动，它至少推进了中国的思想以及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古汉语最终被全然摒弃，书面语言接近人们日常使用的口语，一个同时兼有本土特色和世界性视野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和自己的传统对话，也与世界文学对话，逐步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中国从传统专制阶段被拉进了一个新的民主阶段，尽管民主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科学和民主的到来，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也以一种新的面目进入了中国。它与传统的儒学相融合，摒弃后者的专制教义，弘扬其人文精神的积极内核。我们今天反观历史不难发现，在五四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先进的西学，实际上与人文主义不矛盾，正是科学观念和方法的引进才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欧洲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五四时期，科学与人文主义和谐互补，共同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些杰出的人文学者，如严复和蔡元培，或者率先将西方的科学著作译成中文，或者将西方的科学精神引入中国，尽管他们本人主要是人文学者。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和人文思想家一开始学的是医学，但他在一部电影中看到中国劳工遭受蹂躏和侮辱之后，竟毅然决然地改学文学。在他看来，即使他娴熟地掌握了医术，充其量只能医治几个病人而不能拯救整个中华民族，唯有文学才能起到治疗整个民族疾病的作用。因而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除去其革命的意义外，还带有帮助把中国人民从专制蒙昧的黑暗中解救出来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的启蒙意义。我们今天在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时，必须恰如其分地重新评估这场运动留给我们的两个重要遗产及其对全球文化和世界人文主义的重大贡献。现在当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后人文主义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即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并非是一个简单地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概念，而是带有丰富的本土资源和意义的世界性概念。在引入中国时，它并未与科学呈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与后者和谐互补。可以说，正是有了科学和人文主义这两个重要的思潮的进入才合力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探讨当今风行的后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出发点。如果没有人文主义的传统积淀，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必定成为过眼云烟。

二、后人文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人文主义的挑战

通过上述描述和粗浅的分析，我们大概不能否认，今天在谈论后人文主义时，不得不提及它的前驱

者人文主义,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所高扬的科学精神。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这一事实:虽然人文主义有着丰厚的本土资源,但这个术语本身却是译自西方的一个概念。毫无疑问,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人本身的价值和功能产生了疑问,因而传统的指向人的人文主义以及以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机。当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出现时,欧美各高校的人文学科首当其冲,或者被迫与其他学科合并,或者被大幅度地削减教学人员和研究经费。缺乏科学数据精确意识的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通过合并人文系科和削减人文学者的数量,又能节省多少钱呢?这些有限的资金若用于发展科学和经济,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因而,在今天的中国青年学生中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学习人文学科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丝毫不具有竞争力。他们也无法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与其相对照的是,在后工业社会,机器的作用倒是变得愈益明显和无所不在,它甚至能将人“克隆”或“变性”,在更多场合则会使人丢掉工作。在当今的中国,青年人如果遗失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常常会陷入几乎无法生活的境地,因为这种智能手机伴随着他们而存在,并且无时无刻地掌控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甚至掌握他们的经济收入和支出,使他们无法与之分离。面对机器的这种强大力量,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还能像以往那样利用机器为自己服务吗?这显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却摆在理论家和人文学者的面前,使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和关注。所谓后人文主义,主要就是从文学理论的视角对之做出的反应。人们完全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后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人文主义的终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后人文主义与传统的人文主义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这也正是我在这一部分所要探讨的^①。

后人文主义也像各种“后理论”那样,受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理论的启迪,它对传统的人文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试图将后者解构。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凯瑞·沃尔夫(Cary Wolfe)的专著《什么是后人文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在不同的程度上回答了上述这些问题。正如格雷格·波洛克(Greg Pollock)在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在沃尔夫看来,后人文主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探讨这些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再也无法依赖作为一种自足的、提供给我们赖以了解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的理性存在的‘人’(the human)了(与‘人文主义’相反,而人文主义则利用一个数据来支撑进一步的主张)”^②他实际上告诉我们,后人文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的,它的来临意味着在人文主义时代的那种人类无所不在并具有强大作用的角色已经趋于终结,人类进入了一个“后人类”(posthuman)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类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被认为是唯一具有理性和思想的物种,也不再被认为是地球上所有物种之首领,尽管人类较之那些动物仍有很多优越之处,其中最大的优越之处就在于人类更加聪明并且更加具有理性。此外,较之其他动物,人还有着超级的想象力,他可以创造出各种人间奇迹和艺术作品,而这些恰恰是其他所有物种都不具备的一种特殊才能。但是人类有时甚至可以创造出连自己也无法掌控的奇迹,所有这些特征都在沃尔夫这本有着极大影响和开拓性意义的著作中得到了讨论。因此,我们决不能错误地认为,后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只是对立的,因为后人文主义把人放逐到了边缘。这二者仍然有着一定的连续性和共通之处,只是后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无所不能的作用,还原了人的本来面目。就如同后现代主义之于现代主义一样,二者既对抗,又有着一定的连续性。

那么什么是后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呢?作为后人文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沃尔夫有着一个雄心勃勃的整体计划,也即作为大千世界的物种之一,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人类在宇宙中占据了一个新的位置,它已成了一个居住着我准备称之为‘非人类的居民’(nonhuman subjects)的场所”^③。也即在后人

①关于后人文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及其影响,也可参阅:王宁.“后理论时代”的后人文研究:兼论文学与机器的关系.外国文学,2013,(2);王宁.“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3,(6).

②POLLOCK G. What Is Posthumanism? *Journal for Critical Animal Studies*, 2011, 9(1)-(2): 235.

③WOLFE C.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47.

文主义者那里,人类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人视为唯一的物种,他只不过是与自然中的所有其他物种共同分享地球资源的物种之一。他与其他物种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这种共存和相互依赖的状态中,人类并非总是主宰那些物种的主人,虽然他们的地位仍然显赫和独特,并且在大多数场合能够主宰其他物种的命运,但他们有时也受到自然界其他物种的挑战和威胁。这样的描述我们经常可以在各国的文学作品中读到,有时甚至还可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见到。因此应当承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和谐的,因为人类是自然的一份子,尽管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主人。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使许多人往往认为征服自然和征服其他物种就是他们的宏大计划。结果,人与自然以及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便呈现出一种紧张甚至对立的状态。渐渐地,随着人们征服自然的欲望的膨胀,人与自然以及其他物种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都知道,自然是十分强大的,有时甚至是无情的,它如果对人类抱有敌意就会报复人类。同样,大千世界中的一些动物也是十分凶猛的,尽管它们可以被人类束缚,但一旦它们摆脱束缚,就有可能对人类形成巨大的威胁。近几年来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动物园跑出来的老虎吃人的事件,作为整体的大自然就更是无情。面对数以千万计的自然灾害,个人的力量简直微不足道。近年来,由于人类未能善待自然,大自然便带给我们无以计数的灾难,给我们的财产和人力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与自然抗争的直接后果。

此外,后人文主义给人类和人文主义带来的挑战还体现于它重新设置了人与其所发明的机器的关系。众所周知,人类总是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我们不断地发明各种新型的机器来改善我们的生产力,减少我们的劳动并造福我们及子孙后代。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机器的日益更新,人的力量和作用相应地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诚然,人类可以发明创造一切,但是有时人类也创造出连自己都无法掌控的东西。某些智能性很强的机器的发明以及这些机器的多种功能的开发使它们得以广泛地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军事上和日常娱乐中。这固然对于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或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欢乐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另一方面,人的独特作用很快就被机器所取代,从而致使大批技术工人被挤进失业大军中。后现代条件的出现显然应对此负责,对此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曾作过阐述^①。我们可以说,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性在一个新时代的“扩展的”(extended)和“增大的”(enlarged)形式。同样,后人文主义也是如此,它与其前辈人文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它此时的特征更体现于朝着人文主义的相反方向发展并试图超越后者。

这样看来,后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人的作用的改变,它在相当的程度上使人变得越来越异化了。人类发明了各种大小不等的机器,然而他们一旦发明出这些东西,就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里,计算机、智能手机以及更为先进的人机合一体的生产和不断改进,无疑给当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过去常常由人们手工去做的许多工作现在完全为机器所取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在家里通过智能手机上网购物,而无需去实体的百货商店选购物品。如果对于女人来说,即使是“橱窗购物”(window shopping)也能给她们带来一些审美愉悦的话,那么对于学者来说,他们需要从一本书里得到的东西首先是书里的内容而不仅仅是浏览一下精美的封面。但令人遗憾的恰恰是,实体书店在当今这个商品经济大潮中备受煎熬,主要的冲击来自互联网。过去那种在书店里和志同道合的学界同行一起喝茶切磋学术的现象,如今十分罕见。人们的面对面交流常常被电话和电子邮件甚至微信交流所取代。同样,许多青年人也逐渐地成了机器的奴隶,尤其是成了那些智能手机的奴隶,没有手机他们简直就无法活下去了,或者无法方便轻松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一些病人离开了人机合一体的帮助也无法维系生命。这样看来,传统的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人不总是在驾驭机器,常常是机器(科学技术带来的结果)或多或少地在掌控当代人的

^①LYOTARD J. F. *Rewriting Modernity.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Rachel Bowlb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34.

命运。这正是许多后人文主义理论家所要考察的现象。

在反思现代性带来的种种正面和负面效应时,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在后现代时代,人类并不能总是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有时也无法掌控自己所生活在其上的地球的命运。贝明顿(Badmington)在他的《后人文主义的理论化》(Theorizing Posthumanism)一文中首先描述了后人文主义的不同特征,然后他总结道,“总而言之,后人文主义与非人类是绝对不同的,它处于一种高居于其上的天然的至高无上的位置。”^①这显然是他在考察了人与自然之关系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表明他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在我看来,不管今后后人文主义朝何种方向发展,它都不会全然取代人类的功能和作用。

如上所述,后人文主义在运用于文学研究时也致力于探讨文学与机器之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在那些后人文主义者看来,人的生存已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但是人类仍然不得不经常不断地与自然抗争和谈判,因而最终得以更为舒适地幸存下来。自然灾害完全可以夺去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生命,但是它们却永远不可能毁灭整个人类。人类除去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外,人类的生存还得到某种情感的支撑。文学正是表达人的丰富感情的手段,在后现代时代,机器确实能取代人所从事的一些工作,但是在那些复杂的脑力劳动中,机器无法与人相比。进入电子时代以来,机器的出现也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拿计算机作例子,过去的庞然大物如今成了小巧玲珑的便捷之物,而它的信息储存量变得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多样和复杂。人们完全可以预言,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工翻译将逐渐变得累赘和多余,机器翻译正在逐渐取而代之。有鉴于此,翻译还有何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任何熟悉谷歌翻译功能的人都可以用亲身经历做出相反的证明,那就是在翻译具有鲜明审美色彩和较高文学质量的文本时,谷歌的翻译常常出错,有时甚至将意思译得使人不知所云,更不用说那些带有微妙的象征意义和丰富多彩的意象的文学杰作了。即使是人工翻译文学作品,有着不同审美品位和文学造诣的译者译出的文本也会大相径庭。这样便再一次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只能为那些有着深厚造诣、细腻情感和娴熟的写作技巧的作家所创造出来,他们的劳动是不可能为其他任何再现和翻译手段所取代的,当然也包括机器写作和翻译。只有那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才能欣赏所有这些精致的文化产品,而且只有那些具有广博的知识以及很高的文学和美学造诣的优秀翻译家,才能将复杂多义的文学作品译成无与伦比的母语。因此,后人文主义时代的机器翻译倒是对人工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准确地转达原文中蕴含的基本信息,还要再现原文作者的风格以及原文中蕴含的审美意蕴。

有鉴于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后人文主义只是一种对传统的人文主义有着挑战意义的思潮,但是它本身并没有一种清晰的理论取向。这正是它的弱点所在。关于这一点,贝明顿已经有所认识,并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建议,“后人文主义需要理论,它需要得到理论化,它首先需要的就是重新思考过早地庆祝‘人’的全然终结的看法”^②。显然,贝明顿已经意识到了人的力量的局限,但是他依然强调后人文主义应当有理论支撑,因为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教义已经形成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他甚至请来两位后理论大师——德里达和利奥塔,试图利用他们的后现代主义利器来影响进而动摇笛卡尔的理性基础^③。

毫无疑问,后人文主义的出现提出了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系列问题。正如格雷格·波洛克(Greg Pollock)在评论《什么是后人文主义?》一书时所指出的,“所有的人文主义都分享自由的某个概念——自主性,能动性,意念性以及理性等流行的东西,这些东西通过非人类的缺乏而使得人类稳定了特殊的本体论价值。”^④在波洛克看来,沃尔夫是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影响下写出了《什么是后人文主义?》一书,沃尔夫通过对后人类现象的研究,消解了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从而将人还原到了他原初的作为自然界万物之一的角色。沃尔夫重新安排人的位置,这对人类中心主义的

①Badmington N. Theorizing Posthumanism. Cultural Critique, 2003, (53): 18.

②Badmington N. Theorizing Posthumanism. Cultural Critique, 2003, (53): 10.

③Badmington N. Theorizing Posthumanism. Cultural Critique, 2003, (53): 17.

④Pollock G. What Is Posthumanism? Journal for Critical Animal Studies, 2011, 9(1)-(2): 235.

思维方式是一种警醒。人类再也不居于地球上万物之中心,不再像以往那样处于君临一切的位置。由此看来,后人文主义必定挑战了不恰当地过高估计人类作用的想法,它认为,人类只是地球上万物之一,他们不可能主宰一切,也不可能改变既有的生态结构。那么人类将向何处发展呢?迄今无人给出答案。

总之,在当今这个“后理论时代”,后人文主义依然在吸引着广大人文学者的关注,成为他们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它也和生态批评及动物研究等理论思潮一样,有力地批判并消解了袭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它的出现促使我们思考:在今天人们对现代化的建设中,“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还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普世真理吗?人依然是大千世界中唯一具有理性的物种吗?我们将如何建立一种新型的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应当从后人文主义视角去思考并回答的。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以当前十分风行的“数字人文”潮流作为个案,来说明人文可以与科学互动、互补和共融。

三、数字人文:科学与人文互动、互补和共融的范例

如前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科学与人文并非总是呈对立状态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二者的相通之处会明显地显示出来,我们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沟通和交流的地方,最终使得科学与人文取得双赢。同样,既然这二者经常呈一种互动、互补和共融的关系,那么我们也完全有可能在这二者之间找到结合点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前,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些人文学者在经历了与科学的冲突和对话之后,终于认识到这二者实际上并非是天然对立的,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人文合力推进中国现代性大计的成功经验足资借鉴。因此,他们便试图提出一种可在其间进行沟通和协调的东西,其中“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就是一个备受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热议的话题,它实际上已被一些人付诸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一些保守的人文学者仍十分担心,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的建立是否会摒弃传统的人文精神和正常的人际交流?它是否会导致人的进一步异化?他们试图通过坚守人文主义的立场来阻挡这一科学的或非人文主义的潮流。在西方国家,一些人文学者宁愿通过书信与亲朋好友联系和交流,也不愿使用电子邮件和手机。在中国,一些老派人文学者仍然坚持手写自己的著作,而不愿直接用电脑写作,在他们看来,坐在电脑桌旁,原有的一点灵感也荡然无存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认识到了电脑和信息技术对他们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经常向有关领导提出,需要配备精通英语和电脑技术的青年人作为自己的助理,否则自己的学术研究就难以有效地进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欢迎科学技术干预人文学科的研究,甚至认为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人成功地阻止科学潮流走向我们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大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如果阻挡不了的话,那么我们作为人文学者将如何面对这种影响呢?我认为当下人们热议的“数字人文”也许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至少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服务于我们的人文学科教学、研究、出版以及成果的评价。

人们也许会进一步问道,数字人文的具体特征和长项体现在何处呢?应该说,这是一个跨越学科界限的崭新领域。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只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显然,数字人文,顾名思义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是大学的计算机与人文学科交叉的一个项目。它从人文学科的电脑化、电脑的人性化以及数字人文实践中发展而来,涉及多个学科。它以计算机和数字发表所提供的工具将由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衍生而来的各种方法加以结合。这样看来,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使用当代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来更新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也使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实现“数字化”。可以说,它带给人文学者更多的便利和效率,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更接近科学研究。

毫无疑问,数字人文的诞生使得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带有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精神,同时它也可以促使科学研究变得更人性化,因而标志着另一场新的革命性变革。它表明,使用科学的手段和计算机技术,人文学科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便利、精准和高效。它可以排除一些主观的人为的因素,加进一些

客观的科学的因素,当今时代的文学生产就先行了一步。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一项权威性报告所称,网络文学已经日渐成为文学生产的主流^①,一些优秀的作家不仅不排斥网络的媒介,而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使自己的作品面向更广大的读者大众。确实,今天的作家,包括在纸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已经很少用笔在稿纸上写作初稿,他们很多人直接在电脑上写作和修改文稿,最后交给出版社或杂志社的只是电子文档,而没有那些经历了反复修改的“手稿”。此外,随着网络文学的诞生、普及和网上书店的创立,一大批实体书店也随之关闭了,中国当代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的订数都急剧下降。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文学死了”“文学研究已寿终正寝”。虽然这只是数字化文学生产和发行带来的不利结果,但已经使不少人文学者陷入了恐慌。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数字人文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就在我们为纸质出版物的萎缩和实体书店的关闭而感到担忧的同时,我们却见证了互联网写作的繁荣和网上书店的兴旺。今天,我们的学者和作家无须像过去那样伏案写作,写完草稿后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最后誊清交稿。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那些旧的手稿最终伴随着其作者的知名度或者进入博物馆,或者被扔进废纸箱,不知名的作家的手稿总是无需保留而立即予以销毁。我们只需要在电脑上修改和编辑书稿,最后不留痕迹地将终稿发给出版者,而出版者则会尽快地将其付梓,有时只是将其在线出版而无须印制成纸质书刊。诚如凯瑟琳·菲茨帕却克(Kathleen Fitzpatrick)在谈到数字人文现象时所总结的,“在我看来,它所做的就是介于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研究相交叉的工作。它以两种方式运行。一方面,它运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技术来解决传统的人文学科问题,但同时又使得人性化的研究模式通过数字媒介来承担。”^②这样便使得科学与人文有机地配合甚至结合在一起了,它所能达到的高效和精准无疑是过去单一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难以企及的。然而,人们也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既然人文学科的研究可以数字化,那么对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否也可以像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那样来量化呢?我认为量化在人文学科中固然有不容忽视的缺陷,但更有积极的意义。我这里仅以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两种不同评价方法为例。

我们都知道,评价一个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期刊的质量通常应看它的影响因子,也即如果某个刊物不在高被引出版物之列就不能算作是权威期刊或名刊。在评价单篇论文时,如果该论文发表后无人引用,那就不能被看作是具有独创性或影响力的文章,它很快就会淹没在文海之中。但是在评价一个人文学科期刊时,我们就不能采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需要历史的积淀和时间的考验。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例如西方的尼采、福柯和拉康以及中国的王国维和陈寅恪,也许生前备受争议甚或被人忽视,但是他们死后被人们“重新发现”而拥有了“持续的生命”甚或“来世生命”。一部人文学术著作也可能碰到这样的境遇。在看待单篇论文时,我们不能仅看它在短时间内的被引次数而立即作出判断,因为有时人们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一篇人文学术论文的价值。这样,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考察该论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多大的推进和发展,它在哪些方面较之前人的研究有所创新和突破,它提出了哪些前人未提出的观点,并予以详细的论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此等等。有时,一篇优秀的论文也如同其作者一样,不受到同时代人的欣赏和理解,但是有可能被未来的研究者“重新发现”。对人才的评价更是如此。为了避免漏掉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我们往往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综合评价人文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以便我们能作出恰当的判断。我认为,引入数字人文的科学方法对我们客观地评价一部人文学术著作或论文以及这些成果的生产者——人文学者——将起到有效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用数字化的手段来衡量这个人或他的著作的客观影响力和被引用次数,然

^①参见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报告. 2015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 人民日报, 2016-05-03.

^②LOPEZ A, ROWLAND F, FITZPATRICK K.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 Interview with Kathleen Fitzpatrick. Library with the Lead Pipe. <http://www.inthelibrarywiththeleadpipe.org/2015/on-scholarly-communication-and-the-digital-humanities-an-interview-with-kathleen-fitzpatrick/>. Available: 2015-01-14.

后再将他的材料提交给一批专家组成的评审组进行评估,最后就可以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判断。我认为,近几年来教育部长江学者的评审就基本上做到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一些著述数量不够、从未主持过任何国家级项目或未获得过任何科研奖项者,往往只好对着申报公告叹息自己相距太远。同样,那些在权威刊物上发文太少或被引用次数太低的申请者,肯定经不起第一轮通讯评审就被淘汰了。即便如此,我们有时还是会作出一些错误的判断,遗漏掉一两位确实优秀而其价值尚未得到同行认可的学者。有时一些优秀的人文学者有着特立独行的个性和锋芒毕露的行文风格,在同行中引起较大的争议甚至非议,这时,作为主持评价工作的学术领导者就应当进行一些必要的干预和协调,使得优秀的人才和成果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我认为,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难以统一,但是通过上述科学的方法所得出的评价结果至少要比那种完全由一个人或少数领导说了算的决定显得客观公正些。

总之,数字人文也如同数字化文学生产和流通那样,可以在人文与科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无须去抵制它,也没有必要去指责它不近人情和非人性化,正确的态度是努力使自己适应数字化的进程,最终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学术研究。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On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Posthumanism

WANG N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Posthumanism, as a theoretical trend traveling from the West, has already come to China, raising a challenge against traditional humanism and even humanities. Actually,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s two of the important Western theoretical trends, got on very well and even interacted and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when they first landed on China, which certainly paves the way for us to evaluate posthumanism today. It is true that the rise of “posthumanism”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indicates that human beings in their current stage have become nothing but one of the species in nature, like all the other living things on earth. Thei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law of nature. If we do not see this fact we will not be able to develop ourselves well. Posthumanism comes after the crisis of humanism, but it has certain continuity with the latter. Posthumanism tells us that the era when the role of man is over-evaluated has now come to an end as man has entered into a “posthuman” stage, in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 longer the only rational species, but rather, merely one of the various species on earth. But man could create various miracles, some of which cannot even be controlled by himself. Although the rise of posthumanism is a challenge against traditional humanism and the humanities, it will still be an adequate project if we try to promote humaniti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with a scientific method. Thus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digital humanities may well bridge up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establishing a new interactive, complementar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Key words: science & humanities; posthumanism; digital humanities

● 收稿日期: 2017-04-09

● 作者地址: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上海 200240。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4ZDB08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